

张之洞督鄂与湖北“中学”及“中国文学”

余来明 黄姣雪¹

【摘要】张之洞为清末学制、教育转型关键人物，考察其督鄂期间湖北“中学”教育状况，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书院期，两湖、经心与江汉书院以科举考试为教学导向，分别课以经史和制艺，教员多由张氏幕僚及旧式文人担任；书院改革期，随着张氏科举改革的推进，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在西学冲击下逐渐边缘化，仅两湖书院授经史之学，教习为江苏、广东地区古学专家；新学堂时期，科举废止，各学堂重设经史、文学课，“中学”教习多为鄂籍两湖、经心毕业生。纵观近代知识、教育转型的历史脉络，清末湖北地区“中学”教育的演变虽为地方经验，却因张之洞在晚清学制改革中的关键地位而具有普遍意义。张之洞倡行的“保存国粹”思想及文学观，对近代中国人文学科课程设置、“中国文学”历史形态的早期建构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张之洞 “中学” 科举 国粹 中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54X(2021)03-0084-08

在近代知识转型进程中，新式教育的兴起扮演了重要角色。与传统书院重科举制艺、轻实学不同，新式学堂学制多兼采中西，课程设置以实用为主，旁涉语言、经史。作为晚清学堂教育和学制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张之洞督鄂期间(1889—1907)积极革弊书院旧习，兴办学校努力使之适应时代需要，在客观上改变了学校教育的课程结构和知识体系。在此过程中，张之洞基于办学经验，效仿日本学制规划鄂区新学制体系，由此构筑现代教育学科结构的基本模型。

关于近代转型期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的研究，学界已有所关注，如冯天瑜《张之洞与武汉大学》¹、《作始也简，其成也巨——武汉大学校史前段管窥》²指出张之洞督鄂期间所创办的两湖书院、自强学堂、湖北总师范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汉大学重要源头，在湖北甚至全国的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贡献卓著。王雪华《晚清两湖地区的教育改革》认为两湖地区在19世纪末最后十年后来居上，其实业学堂和普通学堂创办数量和教学质量均高于他省。在张之洞的努力下，湖北成为教育示范省，湖南成为新学最活跃的地区，这些恰好构成中国近代化和革命因素成长的重要动因。³孙劲松《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湖北国学教育》分时段梳理晚清至民国时期两湖书院及新学堂课程设置情况，认为经史之学始终为两湖书院学科之重，新学堂也新旧兼顾，未忽视国学⁴。本文以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教育改革实践为考察对象，在科举沿革与学制演变中探索鄂区“中学”教育的历史变迁，由地域性传统知识教学的考察追索以张之洞为中心的晚清“中学”教育的全国性意义，开启一段对现代学术分科形成的探源之旅。由此说明传统的经史之学与现代文学、历史、哲学等分科体系进行对接，实有复杂、多重面相，而并非只是“西学东渐”的结果。

一、书院旧制下湖北“中学”教育的一般情形

晚清书院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在士林科场逐名的背景下，鄂区书院教育承袭旧制，江汉书院及张氏新建的经心、两湖书院，初期均以科举应试为主要导向。传统书院时期(1889—1897)，各书院以课试方式传授中国传统知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重经史、考古实学，江汉书院重时文，均不脱科举习气。充当书院教习的，主要为张之洞幕僚及旧式文人。

¹作者简介：余来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黄姣雪，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7ZDA243）

光绪十六年，张之洞于经心书院旧址新建两湖书院，以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5〕}的传统型人才为目标。各书院采取课试与会讲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维持科举旧态。各院每月定期举行课试，分教不开堂授课。学生或三五成群到分教房中请教，或由分教拟定时间地点讲授具体专题，学生集体听课，分教所授各就其所长^{〔6〕}，“两湖书院课书向系专门教习，以己学讲授”^{〔7〕}，会讲专题依教习所专而定。因此各书院无统一教材，惟“朔望两课，限五日交卷”。此时两湖书院的课士之法，“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8〕}。因缺乏教习，算学、经济学两门虚悬多年，实际上只有经、史、理、文四科。经心书院“课经解、史论、诗赋、杂著”^{〔9〕}，江汉书院“专课时文，时仍其旧”^{〔10〕}。作为中国第一中西学堂的自强学堂，此时虽已引入西学，但也“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注重中文”^{〔11〕}。

课试内容方面，传统书院不脱科举考试范畴。清代仍以制艺设科，而“乡会后场、学政考试，旁及经解、策论、诗赋，殿廷则兼用之”^{〔12〕}，大体沿用明代旧制。其时虽以时文取士，然“自童试及科岁试、乡会二试，以至各朝考、散馆、大考、考差皆有诗，小试间作赋，散馆、大考皆先作赋，则诗赋未尝废也。自科试至乡会试、殿试皆对策，自童试以至进士、朝考、大考及考军机、御史皆作论，则策论未尝废也”。光绪二十一年以前，童试正场前须先考经古一场，“经古题初为经解、史论、诗赋”^{〔13〕}。康有为《桂学问答》曾论“科举之学”云：“应制所用，约计不过经义、策问、试帖、律赋、楷法数者。若能通经史、解辞章，博学多通，出其绪余，便可压绝流辈。”^{〔14〕}表明除了制艺，诗赋、策问、经解同样是晚清科举的重要考察项目。

从当时斋课实际情况来看，张之洞改革鄂区教育时，三大书院课试试题分时文、经解、策论、诗赋、考史数种，与科考名目基本一致。光绪十四年冬，当时主讲经心书院的左绍佐将一年所得诸生官课课卷汇编成《经心书院集》四卷，其中卷一、二为经解，有《郑君笺诗多以韩易毛说》《禹河故道迁徙考》《辟雍解》《千乘之国解》等10题，选49篇；卷三为论著，有《荀卿论》《读韩昌黎〈守戒〉书后》《劝桑树议》《科举论》等7题，选22篇；卷四为诗赋，有《谒曾文正公祠》《拟杜工部诸将五首》《苦热行》《拟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一首》《积雨赋》《惟楚有材赋》等16题，选46篇。此时作为两湖书院前身的经心书院，课试内容由经解、论著、诗赋三部分构成，学生日间诵读经史典籍，研习诗文义法，而“以治经为先”。光绪二十一年，时任经心书院山长的谭献“赓续哀集官师课作，得文笔三百篇”，编为《经心书院续集》。该集共十二卷，分说经、考史、著述、辞章四部分，卷一、二“说经”29题44篇，卷三至卷五“考史”48题89篇，卷六至卷八“著述”34题70篇，卷九至卷十二“辞章”65题109篇。在序文中，谭献指斥世俗之士以帖括自封，不诵经书，不睹史籍，朝廷虽以《四书》《五经》义取士，而“提学试有经古，春秋试有策对”^{〔15〕}，认为八股帖括并不能完全应付科举，而时常课以经训文辞，对科举之经古、策对深有裨益。光绪十八年，时任江汉书院山长的周恒祺汇集光绪辛卯、壬辰两年诸生课卷编为《江汉书院课艺》（两册），所收均为四书文，也主要为科举八股制艺服务。

这一时期两湖书院课试情况，还可由唐才常遗留下的数十篇课卷窥见一斑。唐才常于1894—1896年在两湖书院肄业，所作课艺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孝经为六艺总会说》《说论语赋》《历代商政与欧洲各国同异考》《钱币兴革议》《中国钞币必如何定制综论》《征兵养兵利弊说》《唐租庸调法得失考》《汉书艺文志群经次第与史记儒林传不同考》《闲传释例》《元史宗室世系表太祖子封地当今何地考》《问土蕃回纥不得志于唐而契丹女真蒙古皆得志于宋能言其故欤》等篇^{〔16〕}。唐才常曾在家信中称“二月望课揭晓，兄经史二卷均第一”，“所应诸课，差幸不居人后，居第一者已五次”，其所作课卷可以大体反映当时两湖书院的整体学术倾向：从内容看，既有面向传统经史之学保守锢闭的一面，又有面对时代环境开放务实的一面。看似矛盾，却恰显示出两湖书院融新旧之学为一炉的教学思路，也预示此时旧书院已出现学术转型征兆。唐氏课卷分考史、经解、诗赋、策论四类文体，与经心书院略同。可见两湖书院课试允许学生在思想方面对传统有所突破，而形式上则不离科举这一“旧瓶”。

除制艺外，晚清两湖、经心书院所课试的经史、词章也属科举考察范围。康有为主讲万木草堂，每月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练习义理、经世、考据、词章试题，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练习《四书》、《五经》试帖、《四书义》策问、《四书义》律赋等功课^{〔17〕}，采取经史、词章与制艺并重的中和策略。鄂区传统书院同样未能彻底与科举划清界限，虽然两湖、经心书院已规定不准课试时文，但张之洞并不反对两院学生到经心书院应课。有论者指出，湖北经心、两湖书院承学海堂绪余，专治经史、考古之学，对晚清学术不无影响，“但是从教育推广的观点看，张之洞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政策使之普及。因此，湖北绝大多数书院，仍旧以准备科举考试为目标”^{〔18〕}，两湖、经心书院诸生如江汉书院学生一样应课并参加科举考试。张氏先后创办的广

雅、经心、两湖书院，虽然出发点在于拯救学术空疏之弊，但其课试的策论、诗赋、经解等也是科举考试的重要部分。这样的措置，与明清时期科举改革一脉相承。

三大书院或课以经史、诗赋，或课以时文，不离科举试策考察范围，惟两湖书院唐才常课卷常与时局紧密结合，显示出超前的眼界和开放的格局。这种现象的出现，除唐才常个人因素外，还与两湖书院教习构成有关。江汉书院山长周恒祺，经心书院主讲左绍佐、山长谭献为旧式文人，而两湖书院教习多为张氏开明派幕僚，各科分教“前后任经学者，为易顺鼎、杨裕芬、钱桂森。任史学者，为杨锐、汪康年、梁鼎芬、姚晋圻。任理学者，为邓绛、周树模、关棠。任文学者，为陈三立、屠寄、周锡恩、周树模、杨承禧”⁽¹⁹⁾。诸人均为新旧学兼通的饱学之士，大多思想通达，力赞革新。如杨锐为张之洞在四川尊经书院时的学生，热心时务。陈三立、汪康年为维新人士，后参与康、梁变法。周锡恩热衷于致强之道，张之洞曾称：“予老门生，只汝一人提倡实务。”⁽²⁰⁾缘于张之洞中西、新旧兼容包并的教育理念，两湖书院中教习以重时务的新派人士居多，一定程度上对受业学生思想倾向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传统书院与科举制共存亡，经史、诗赋等“中学”内容，应科举考试之需，在晚清旧书院中仍大行其道；而后随着书院改革、科举改革的推行，“西学”进入科举考试范围，技术、语言等类专门人才受到重视，由此对中国传统知识教学产生巨大冲击，从而促使传统经史之学向分科演化。

二、书院改革时期湖北“中学”教育的演变

在知识界大力引进“西学”的同时，教育领域的改革也随之而来。张之洞一方面主张改革科举，另一方面在书院中推行“中西并制”的课程体系。书院改革时期(1897—1902)，湖北书院的教学方式改为集体授课，课程设置逐渐“西学”化。“中学”之理学、文学从传统知识教学中退场，经史之学仅在两湖书院教授，且于“西学”普被浪潮中被边缘化。前期“中学”教习或投身变法运动，或赴任他省，张之洞不得不在教育较发达的广东、江苏地区另聘经史专家担任教习。

张之洞秉承“经世致用”教育理念，通过引进“西学”，缩减“中学”科目，推进科举改革。这一时期，各书院逐渐向学堂转变，教学方式由分授变为班级集体授课。光绪二十三年春，张之洞新定两湖书院学规课程，规定各科教师须到堂上课，学生亦须住堂肄业，外出需请假，给假不得超过半日，除乡试外不准给假应试。⁽²¹⁾同时，实行更为严格的奖励考核制度：学生每月奖金等级由平日读书笔记、分教随时面加询考时的表现、官课成绩三部分决定。书院将学生二百四十人分八排，以单双日轮课方式分习经、史、地、算四科，“前四排单日经、史，双日地、算；后四排单地、算，双日经、史”⁽²²⁾。经心书院则“酌照学堂办法，严立学规，改定课程，一洗帖括词章之习，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²³⁾，由原来课经解、史论、诗赋、杂著，改为分习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门。第二年，完成第一次书院改革的张之洞在《劝学篇·变科举》中提出变革科举初步构想后，上呈《妥议科举新章折》，得到朝廷认可。随后下令依照张氏所拟，全国科举不得考时文，乡、会试分三场分别测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的时务策五道，《四书》义、《五经》义各两篇，翰林也不得专以楷书及诗赋定优劣。张氏《劝学篇·设学》约学堂之法“新旧兼学”“政艺兼学”⁽²⁴⁾，所列新旧、政艺之学如《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西政、西艺，与《劝学篇·变科举》所拟考试内容完全吻合，目的仍在于更新科举制度以与新学堂相适应，为朝廷培养、选拔新式人才。光绪二十五年，慈禧太后在懿旨中进一步申明，“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现在时势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²⁵⁾，表明朝廷立场，令各书院务必兴办实学以富强中国。变革科举、改革书院得到官方认可后，张之洞又将两湖书院的“地图”一门改为“兵法”，分兵法史略学、兵法测绘学、兵法制造学三门。经心书院添设图画、兵法、体操。江汉书院改革办法及学科与经心同，分教由经心书院分教兼任。至此，三书院基本完成改革。

从相关政令颁布的时间线索来看，科举改革与书院改革交叉进行，科举变革成为书院改革后期的强大助力。与科举改革相呼应，书院改革期各书院注重引进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西学”成为晚清书院重要教学内容，“中学”科目和课时均被缩减，逐渐湮没于“西学”普被的浪潮之中。此时两湖书院的经史之学原系书院所当讲求，因此得以保留，“理学书每日晚间限定必

看数条”⁽²⁶⁾。经心书院则经史、文学均无讲授，仅由院长“专讲《四书》义理、中国政治”⁽²⁷⁾，由监督随宜训课。后来由于监督院事繁忙，乃专设经史一门，“添请分教一人，每月课以经史一次，或解说，或策论”。江汉书院亦于四门分课之外，专设经史一门，每月课试一次。同时，三书院均设行俭一门，“由各监督、院长每日酌定时刻，分班接见，训以《四书》大义、宋明先儒法语，考其在院是否恪遵礼法”⁽²⁸⁾。除两湖书院外，其他书院及学堂内授课内容以“西语”及“西学”为主，“中学”教学用以训诫学生率循规矩，成中西兼顾之旨。

在此期间，沈曾植、陈庆年担任两湖书院史学教习，马贞榆、曹元弼、杨裕芬、张锡恭任经学教习。沈曾植精通音韵、书法、历史、舆地之学，在当时有“硕学通儒”之誉。他“深于史学掌故”，“中年治辽、金、元三史”，著有《蒙古源流笺证》《元秘史笺注》。陈庆年为史学专家，编有《中国历史教科书》《兵法史略学》。马贞榆为陈澧入室弟子，光绪二十五年起在两湖书院为学生讲《左传衍义》《读左传法》。曹元弼在两湖书院期间撰《述学》篇，授诸生“各经传述源流、定治经者不易之途径”，与梁鼎芬共同辑成《经学文钞》，作为经学课程讲义。杨裕芬在两湖书院授《毛诗》。张锡恭授《论语》《周礼》。由于此前两湖书院“中学”教习多具革新精神，对学堂管理及旧学传播颇为不利。张之洞向来视经书为“中国之宗教”⁽²⁹⁾，出于尊经传统，特从江苏、广东地区延请经史专家担任两湖书院“中学”教习。

这一时期鄂区改革科举、改章书院、大兴西学，一时成为全国教育典范，甚至远超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京师大学堂开学，新入学诸生犹“兢兢以圣经理学诏学者，日悬《近思录》、朱子《小学》二书为的”。次年秋，“学生招徕渐多，将近二百人。……大学堂虽设，不过略存体制；士子虽稍习科学，大都手制艺一编，占毕咿唔，求获科第而已”⁽³⁰⁾。此时期的京师大学堂不仅招生规模远不及鄂区，并且由于缺乏新式教育改革人才的统筹帷幄，其新体制下的学堂亦徒具形式。学堂中应试之风远胜于西学，教学以科举为主导，科举之学在新学制内仍占领主要阵地。之后1900年京师大学堂停办，直到1902年由张百熙任总管，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³¹⁾尽管此时张之洞并未忽视经史之学，延聘江苏、广东地区优秀教习，使经史两科在两湖书院保留下来；然而同时规定，科举考试第二场须通西方政艺，教学中“西学”科目占据大量课时，明显削弱了以经史为主体的传统知识的学科地位。在此情形下，“曾经作为科举殿堂敲门砖的‘中学’也逐渐由受青睐而变得受冷落”⁽³²⁾，反映出传统“中学”既受西学冲击又受制于科举的尴尬处境。

三、科举废止与新学制下湖北“中学”教育的转折

随着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张之洞等奏请废除科举，经史、词章等“旧学”科目进入新学制，科举考试课程体系瓦解，课试方式改为计日功课。因中高等学堂教科书尚未编定，此间学生所习以《奏定学堂章程》指定书目为准。这一时期，湖北各学堂“中学”教习多为鄂籍两湖、经心书院毕业生，主要阵地由两湖书院转移至两湖总师范、存古学堂，方言及其他专门学堂虽设汉文课程，然终究为“西学”“西语”附庸，堂内传统知识教学远不及两湖总师范、存古学堂有代表性。

传统书院时期“中学”赖于科举而兴，而此时传统“中学”科目过渡到新学堂，成为科举制废除的重要催化剂。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张之洞在《请试办递减科举折》中指出，“科举未停，则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也”，“入学者恃有科举一途为退步，既不肯专心向学，且不肯恪守学规”。在张氏看来，科举制是兴学堂的最大障碍，科举不废，新学堂无法正常运行。为实现由科举取士向学堂教育转变，张氏拟定各学堂课程时，“于中学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³³⁾。之后癸卯学制颁布，科举制下的经史、词章等传统旧学进入新学堂，然而各级学堂“西学”科目数量和课时均超过“中学”，科目设置呈现“西主中辅”的混合模式。光绪二十九年，两湖书院改为文高等学堂，学科有中西公共之学——经学（道德学、文学附）、中外史学（掌故学附）、中外地理学（测绘学附）、算术（天文学附）和西学——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兵事学八门。未及一年，文高等学堂改为“两湖总师范”，学科有修身、读经、中文、教育、算术、英语、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博物、手工、音乐、体操，其中修身、读经、中文、历史诸科为“中学”科目。

癸卯学制颁布后，学部陆续审定各地呈送的小学堂教科书，湖北地区小学堂开始使用学部审定的试行教材，如两湖总师范

附属两等小学堂“中学”修身课用《初等修身教科书》，经学课讲《论语》《孝经》《孟子》《礼记》，文学课用《初等国文教科书》，历史课用《初等历史教科书》⁽³⁴⁾。高等学堂教科书直到1909年尚未审定，因此两湖总师范学堂从1906年开学到1911年停办，期间“中学”授课具体内容仍以《奏定学堂章程》为准。1904年湖北学务处印发《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级师范学堂“修身”课“摘讲陈宏谋《五种遗规》”，“读经讲经”课“讲读《春秋左传》、《周礼》两经……讲读《左传》应用武英殿读本，讲读《周礼》应用通行之《周官精义》”，“中国文学”课则以“《御选古文渊鉴》最为善本”⁽³⁵⁾。两湖总师范实际教学中使用的教材基本与此吻合，据1911年《两湖总师范学堂调查总表》，1906至1911年在校肄业诸生“修身科用陈宏谋《五种遗规》本，教育科课本由本科教员编辑，读经讲经科用《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文学科采用《古文渊鉴》本，历史科用《中国历史》丹徒陈庆年本”。至于当时教学情形，据朱峙三回忆，经学教习李文藻第一节课讲《左传》。之后黄福讲文学，虽“素有名文”，却“了于心，不了于口”；另一文学教习叶恭绰讲文法，在黑板上书自编文一篇，“嘱予等抄之，实不见佳”。史学教习李步青为革命排满者，修身教习马贞榆“经学有时名”，为一时经学名师。⁽³⁶⁾总师范学堂“中学”教育仍以传统经史及作文文法为主，显然对已接受过传统私塾熏陶的学堂诸生难有吸引力。在此之前，马贞榆讲学文高等学堂期间编有《两湖文高等学堂经学课程》教材，其中《尚书》两卷，卷上论尚书学之源流，卷下论伪古文之破绽；《尚书要旨》一卷，有《圣德》《圣治》《唐虞重天文》《唐虞重地利》《唐虞重农政》《唐虞重祀典》《帝王重择相》《圣学之节目在逊志时敏》《帝王慎择师》等篇，“是书分目细碎，大抵以圣治圣学为纲”⁽³⁷⁾。从书院改章期的《左传》到文高等学堂的《尚书》，马贞榆因师承东塾学派陈澧，提倡朴学，故多致力于考证辨伪，其《经学课程》讲义作为文高等学堂“中学”教育重要内容，体现出传统书院向新学堂转变过程中重考据、崇圣学的学术倾向。

相较而言，作为近代转型期湖北地区“中学”教育重镇，存古学堂研习内容比两湖总师范更精深。在张之洞绘制的蓝图中，学生入学后须大量阅读古代典籍：治经者前两年须遍览九经全文，次看群经总义诸书，第三、四年须点阅所习本经国朝人著述；治史学者前三年点阅《御批通鉴辑览》、五种纪事本末，以及历代正史之志及补志，第四、五、六年习二十四史和通鉴、通考类；治词章者前三年“先纵览历朝总集之详博而大雅者，使知历代文章之流别”，点阅古人有名文集。存古学堂初期教学情形与张氏构想大致相当。据该堂经学门学生罗灿回忆，马贞榆讲《周礼》，黄福讲《仪礼》，傅延义讲《说文》，曹元弼仅编讲义供学生学习，吕承源讲史学泛论，陈澧韦教词章，“校发梁钟嵘《诗品》三卷和唐司空图《诗品》翻印原文”⁽³⁸⁾。第一班学生学习所用书籍，“由公家发给《十三经注疏》、汉四史（《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二十二子、《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各一部，及其他小部书籍”⁽³⁹⁾。堂中诸生“认习专经者，如正、续《皇清经解》之类，每五人合给一部；治史则《御批通鉴》之类每人各给一部”⁽⁴⁰⁾，堂内经、史、词章各有所授。王仁俊任教湖北存古学堂期间编有《存古学堂经史词章课程》讲义85篇，该讲义不分卷，由《易经》学、《书经》学、《诗经》学、《孝经》学、《春秋》学、《左传》学、《尔雅》学、《说文》学、《论语》学、《孟子》学、《词章》学等部分构成，为王氏讲经之作，后收入《存古学堂丛刻》。就各部分篇目比重来看，《五经》为重中之重，词章学仅两篇。马贞榆编有《今古文〈尚书〉授受源流》一卷，就《尚书》“考今古文授受源流”，末附以辨经义考。此时曹氏又将其光绪三十年刻于苏州的《原道》《述学》《守约》三文稍加润色，授与学堂诸生。光绪三十四年，存古学堂刻印梁鼎芬、曹元弼合辑《经学文抄》以作教学之用。由教学情形来看，由于科举废除与学科分化，两湖总师范及存古学堂“中学”教育重新回到经史、词章并重的局面。

新学堂时期，两湖总师范、存古学堂教习多由鄂籍两湖、经心书院毕业生担任。据《两湖总师范学堂教员调查表》，当时各科教习除物理科由日本人三泽力太郎担任，修身教习马贞榆为广东顺德人，文学教习杨鸿发为江苏丹徒人之外，其余教习如修身教习吕承源，教育教习吴赐宝、余德元、王先庚，经学教习杜宗预、李文藻、王劭恂、王廷梓、尹潮，经学兼文学教习黄福，历史兼经学教习傅延义、彭邦桢，文学教习萧延平、胡柏年、余岳霖，历史教习雷预钊、邱岩，以及地理、算学、习字、图画、体操、音乐、手工、博物教习共37人均均为鄂籍，占两湖总师范教习总数（48人）大半。这些教习资历多为廪生、举人，且多毕业于两湖、经心书院。设立于1907年的存古学堂，总教习为杨守敬、马贞榆，各科分教有王仁俊（经学）、傅守谦（史学）、杜宗预（斋务长兼史学、外国史）、王劭恂（监学兼史学）、黄福（词章），协教黄燮森（经学）、陈澧韦（词章）、吕承源（词章）等。其中黄福、吕承源、傅守谦、杜宗预、王劭恂、黄燮森均为鄂籍：黄福毕业于经心书院，时任黄冈教谕；吕承源毕业于经心书院，时任通城县教谕，在任候选知县；傅守谦曾肄业两湖书院；杜宗预毕业于经心书院，廪贡生，内阁中书衔，俟教职选缺后以知县在任候选；王劭恂曾肄业两湖书院，兼任经心书院经史教习；黄燮森曾肄业晴川书院，增贡生，试用县丞。此时“中学”教习

多由鄂籍两湖、经心书院毕业生担任，体现出强烈的地域性，也昭示过去由科举培养选拔各界人才的模式正在向系统化的学校教育转变。

经史、词章进入新学堂，与张之洞以退为进废科举的政治策略密切相关。新学堂以培养中西兼通的实用人才为目的，“中学”教育此时由最初以科举为导向变为以保存国粹为最终目标。在此义下，经史、词章等国粹开始作为知识之一类在新学堂中被教授和学习。在新式教育体系下，传统经史的尊崇地位被颠覆，分科教授的内容虽然还带有很浓的“旧学”色彩，却已经充分做好了容纳“新知”的准备。现代学术分科体系的形成和知识体系的转换，与这一时期中西知识交汇背景下分科授学的教育改革也有密切关系。

四、由“中学”到“中国文学”：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中学”教育的学术史意义

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由其主导的改章书院、兴办学堂教育改革实践是湖北地区近代转型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其中“中学”教育部分又在多方面具有全国性意义。

其一，张之洞改革鄂区教育期间始终以经史为国之根本，期间发起的保存国粹运动，使中国传统知识进入民国新教育系统成为可能，并确立了词章之学在新学制中的地位，为民初“中国文学”的课程设置提供了借鉴。学堂改革过程中，张之洞发现各学堂趋重西方科学，其他地区新学堂诸生甚至“言洋务尚粗通，而《孟子》之文反不通”⁽⁴¹⁾。为避免科举废除后“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⁴²⁾，经学、小学、诗、古文辞等中国传统学术无人考究，张氏在《学务纲要》第十一条提出重视国文、保存国粹主张，并巧妙地将经史、词章等旧学融入新学制。张氏保存国粹理念一时成为时代思潮，一时间各地时报、教育报刊登大量“保存国粹”的言论，如《重国文以保国粹说》《论学堂宜注重国文》《学堂宜设国文专科策》等。光绪三十三年，张之洞筹谋许久的存古学堂成立。之后在清政府支持下，山东、四川、江苏等多地兴办存古学堂，普通及专门学堂增设“国文”课，如江宁（南京旧称）省垣高等学堂总教习缪小山指出：“因现在停废科举，恐国粹难以保全，特于该学堂内添设国文一科。”⁽⁴³⁾各地兴建存古学堂、增设国文课，正是张之洞“保存国粹”思想的具体实践，体现出时人对科举废除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生存空间的忧虑。

科举考试废除以后，儒家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失去生存根基，加上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思想盛行，传统旧学在新式教育体系中被虚无化和边缘化。张之洞办学过程中对经史之学的坚守，以及向传统回归兴办存古学堂，推动“保存国粹”思潮的兴起，一定程度促成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学”科目在清末教育系统得以延续。“中学”中词章之学也因此从科举试策过渡到新学制，变为“中国文学”科。虽有梁启超指出“词章不能谓之学”⁽⁴⁴⁾，张之洞却认为“各体词章，军国资用，亦皆文化之辅翼，宇宙之精华，岂可听其衰微，渐归泯灭……中国之文理、词章废，则中国之经史废”⁽⁴⁵⁾，明确肯定词章之学在中国传统学科中的地位。他在写给张百熙的信中指出，“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而文章浅易，世人可由文章理解经史而达于道，认为中国文辞作为国粹具有传播儒家文化的实用性功能。缘此，词章之学不仅进入新学制，还因“国粹”带来的文化立场使癸卯学制“中国文学”门诸多课程在民国以来的学科体系中得以延续。如创办于1913年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史地部一年级均开设国文课，英语部国文讲授的文学源流，即源于奏定章程中“历代文章流别”。1916年英语部一年级国文课分学期讲授诸经、史、子、集文体。1929年由武昌高师演变而来的国立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系，必修课包括“国文讲读及作文”“文字学”“古书校读法”“目录学纲要”“文学史纲要”“诗名著选”“经学通论”“《文选》学”“《史记》”“《吕氏春秋》”。选修课有“文学源流”“楚辞研究”“宋诗”“佛典文学”“魏晋六朝史”“亚洲文化史”“近代外交史”“经济地理”。必修课“文学史纲要”和选修课“文学源流”可追溯至“癸卯学制”中“中国文学”科需讲“历代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与政事、身世关系处”⁽⁴⁶⁾的规定。“文字学”则源于对“文者积字而成，用字必有来历（经、史、子、集及近人文集皆可），下字必求的解”⁽⁴⁷⁾的强调。“目录学”根源于补助课“《汉书·艺文志》补注、《隋书·经籍志》考证”⁽⁴⁸⁾，“诗名著选”、“宋诗”等课程以“集部”之学为研究对象，相当于新学制必修课“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张氏“保存国粹”思想是“中国文学”科产生的重要因素，并由此推动衍生诸多文学课程，成为民国时期高校中文系“文学史”、“文字学”、作品选等课程的直接源头。

其二，张氏改革鄂区教育期间，由“中学”词章到“中国文学”，其分科意识及“文学”观直接影响了清末新学堂文学设科，进而决定了晚清“文学”史的基本书写形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文学呈现怎样的历史面貌，即取决于以何种‘文学’概念及其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建构的支点。”⁽⁴⁹⁾同样，清末“中国文学”讲义如何编写，文学史如何叙述，亦主要取决于癸卯学制“文学”科最终修订人张之洞的文学观。当时社会中流行的文学观有广、狭两义，一指“包括哲学或经学、史学、地理学、语言学及文学等各科在内的人文学科”，一指“大体上可与偏重文学之语言研究的古典语文学相对应的词章学”⁽⁵⁰⁾。1904年由张之洞最终修订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的文学科，由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中外文学三部分构成，文学科之“文学”相当于人文学科，为广义文学，与张百熙《钦定学堂章程》以文学科包括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7门课程做法略同。只是张百熙“文学”科基本可与“中学”概念对等，而张之洞则有了明显的经学、史学、词章学分科意识。他将“经学”单独设科，原文学科“诸子学”归入“理学”门，原“经学”、“理学”门归入经学科。尽管如此，张之洞未能摆脱时代局限，他将文学科“词章”学变为“中国文学”，7门主课分别为文学研究法、说文法、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⁵¹⁾，此“中国文学”源于词章之学，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相比为立足于文字而广涉语言、音韵、文章等各方面知识的泛文学。

作为新学制文学科“中国文学”门课程总设计师，张之洞泛文学观影响了代表着当时中国学术基本方向的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课程讲义(出版时定名为《中国文学史》)的编写。1904年林传甲时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国文教员，他严格遵循《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研究法”编写出中国第一部“中国文学”课程讲义。该讲义篇目与“文学研究法”要义前16条相合，从文字讲起，又讲音韵、训诂、修辞、群经、诸史、诸子，“体系庞杂，文学观念不清”⁽⁵²⁾，为“经史子集的概论”⁽⁵³⁾，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迥异。与林传甲同时期的王葆心在《高等文学讲义》中指出，“凡学术中须主文字以讲之者，皆可隶入文学”，同样传达出以文字为基点的泛文学观。《高等文学讲义》之后再版名称改为《古文辞通义》，多少暗示了王葆心文学观所发生的变化。林、王二氏“中国文学”讲义传达出的文学观与张之洞“文学研究法”实出一辙，这既是当时主流文学观的具体反映，也是张之洞将其泛文学观通过学堂教育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制度化的结果。

在张之洞的引领下，湖北地区“中学”教育经历了传统书院期、书院改革期和新学堂时期。不同时期“中学”教育与科举制兴衰密切相关，各时期教习成员的变化，体现出在新的教育模式下，分科教学成为普遍趋势，并逐渐承担起培育和选拔各界人才的功能。张之洞作为湖北地区教育近代转型以及推动国民教育近代化的关键人物，他在“保存国粹”思想下设置的诸多“中学”科目，构成近代高校中国文学课程体系的雏形，其泛文学观主导下制定的“中国文学”教学内容和方法，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早期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形态，对民国以后人文学科课程设置、文学史书写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 冯天瑜：《张之洞与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1期。

2 冯天瑜：《作始也简，其成也巨——武汉大学校史前段管窥》，《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6期。

3 王雪华：《晚清两湖地区的教育改革》，《江汉论坛》2002年第7期。

4 孙劲松：《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湖北国学教育》，《文化发展论丛》2013年第2期。

5(8)张之洞：《咨南北学院调两湖书院肄业生附单》，《张之洞全集》第5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225页。

6 李珠、皮明麻：《武汉教育史》(古近代)，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7(29)张之洞：《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张之洞全集》第4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92、94页。

-
- 8(10)(19)张继煦：《张之洞治鄂记》，民国铅印本，第9、9、8页。
- 9 况周颐：《餐樱庑随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4辑，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135页。况周颐自称于戊戌年间任自强学堂汉文教习。
- 10 戴熙：《崇文书院敬修堂小课甲编·序》，咸丰八年刻本。
- 11 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2辑，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10页。
- 12(17)康有为：《桂学问答》，《长兴学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0、21页。
- 13 谭献：《经心书院续集·序》，光绪乙未冬仲湖北官书处刊本。
- 14 唐才常：《唐才常集》，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80-581页。
- 15 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43页。
- 16 刘禹生著、钱实甫校：《世载堂杂忆·张之洞遗事》，《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1页。
- 17(22)(26)《新定两湖书院学规课程》，《湘学新报》1897年第7期。
- 18(27)张之洞：《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张之洞全集》第3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480、480页。
- 19 张之洞：《劝学篇·设学》，《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 20 《德宗景皇帝实录(六)》卷43，《清实录》第57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54-655页。
- 21 张之洞：《札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改定课程》，《张之洞全集》第6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202页。
- 22 参见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朱有巘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83页。
- 23 陈国球：《文学立科——〈京师大学堂章程〉与“文学”》，《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 24 武教办：《湖北存古学堂的兴衰》，《武汉文史资料》2009年第10期。
- 25(42)张之洞：《请试办递减科举折》，《张之洞全集》第4册，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171页。
- 26 《两湖总师范附属两等小学堂调查总表》，《学部官报》1911年第156期。
- 27(46)(47)张之洞：《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3辑，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湖北学务处本，第277-281、282、281页。

28 朱峙三：《朱峙三日记：1893-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 2011 年版，第 193 页。

29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258 页。

30 (39) 罗灿：《关于存古学堂的回忆》，《湖北文史资料》第 8 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4 年版，第 55、56 页。

31 陈佩实：《考查湖北存古学堂稟折》，《广东教育官报》1911 年第 5 期。

32 参见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37 页。

33 缪小山：《高等学堂添设国文》，《北洋官报》1905 年第 873 期。

34 梁启超：《万木草堂小学学记》，《梁启超全集》第 4 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5 页。

35 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张之洞全集》第 4 册，武汉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03 页。

36 (51) 张之洞：《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2 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85、785 页。

37 余来明：《“文学”概念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0 页。

38 陈广宏：《文学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56 页。

39 周勋初：《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文学遗产》2000 年第 1 期。

40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平朴社 1932 年版，第 10 页。